



南雍学术经典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牟宗三哲学 与文化论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雍学术经典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牟宗三哲学 与文化论集

白欲晓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牟宗三哲学与文化论集 / 牟宗三著;白欲晓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
(南雍学术经典)

ISBN 978 - 7 - 305 - 07613 - 8

I. 牟… II. ①牟… ②白… III. ①牟宗三(1905~1995) - 新儒学 - 哲学思想 - 文集 IV. B261.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60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从 书 名 南雍学术经典
书 名 牟宗三哲学与文化论集
著 者 牟宗三
编 者 白欲晓
责任编辑 雷旭华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9.25 字数 406 千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7613 - 8
定 价 58.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序

鸿编三

学术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在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世纪回眸”中，我们在重估和评价百年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就中国现代人文科学而言，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留下前辈学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他们的独辟蹊径汇成了我们的康庄大道。

众所周知，南京大学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百年高校之一。她有两个历史源头，一个是肇始于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创立的三江师范学堂。历史上各朝唯一的国家高等学府如太学、国子监等皆可称为“辟雍”，而明代曾于北京和南京各设一所国子监，号称“北雍”和“南雍”。因此，作为清政府创办于南京的新式学堂，三江师范在当时也就承膺了“南雍”的美誉。1914 年以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时期，1949 年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次年定名为南京大学。另一个是 1888 年（光绪十四年）成立的基督教会汇文书院，后来发展为金陵大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全国院系调整中与南京大学合并，构成了现在的南京大学。这样的经历不仅显示出她的悠久，还显示出她的坎坷——不断地更名，不断地重组、合并、调整。其实这正是中华民族近现代颠沛历史的缩影。而南京大学历经沧桑，卓然屹立，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传统，涌现出众多的名师大家，给我们留下丰硕的学术遗产，其中必有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这大概就是南京大学的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其中“诚”字最为根本，也是南京大

学历史上最早的校训。“诚”是真实而不虚妄的真理，也是追求真理、诚信不欺的美德。

南京大学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是南京大学精神的典型体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民族文化的重建过程，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充满了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科学、玄学的争论，“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是当时中国大学总体性的人文精神，而历史上的南京大学又提出过具有自我取向的“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人文与科学平衡”等学术主张和办学宗旨，可见南京大学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态度，走的是温故知新、继承创新的学术路径。她的两个历史源头已经显示出这样的学术趋向：一是建立在中国教育传统上的“新学”，但提倡国学、艺术与科学三者兼通融合；一是具有西学东渐背景的教会大学，却对中国文化重视有加，成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较早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这样的源头活水，不断地吸纳志同道合的名师大家，汇成源远流长、独立不迁的学术传统。

今天，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的时代，南京大学迈向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进程，我们饮水思源，愈加感到受益于这些名师大家们赋予我们的学术财富和精神力量，愈加渴望对他们孕育的传统加以系统的研究总结，返本开新，发扬光大。

“南雍学术经典”丛书是南京大学历史上学术大师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精选。它吸收中国传统学术史中“学案”的编纂形式，邀请大师们的学术传人或研究专家，精选荟萃大师们的学术代表作，对其生平、学术加以述评并制作学术年表，再按不同的学科陆续分辑出版。这样一项研究性的出版工程，不仅勾勒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脉络，而且在新的视角下展示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精华，其中不乏首次被整理、公布的珍贵资料。同时，为了进一步展示20世纪南京大学的学术面貌和学术贡献，我们以后还将陆续推出其他学术大家的经典著述。我们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不仅是南京大学学术传统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且也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份极富价值的学术文献。

2008年3月28日

目 录

导读.....	1
(一) 卞宗三先生的学思历程	2
(二) 卞宗三先生学术思想述评	17
卞宗三学术论著精选	35
(一) 自述与访谈	35
1.《五十自述》(节录)	35
2.说“怀乡”	68
3.哲学之路——我的学思历程	72
4.鹅湖之会——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大综和与中西传统的 融会	80
(二) 哲学与哲学史论述	90
1.《逻辑典范》前序	90
2.《认识心之批判》.....	96
第一章 认识论之前提 第二节	
第三章 心觉之主观性与客观性 第一节	
3.《王阳明致良知教》	119
第三章 致知疑难	
4. 论黑格尔的辩证法	132
5.《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	140
第 18 节 智的直觉如何可能？儒家“道德的形上学”之完成	
6.《现象与物自身》	157

第二章 德行底优先性	
7.《圆善论》序言	172
8.真善美的分别说与合一说	183
9.《心体与性体》	207
第一部 综论 第一章 宋、明儒学之课题	
第一节 正名:宋、明儒学之定位	
第二节 所谓“新儒学”:新之所以为新之意义	
10.《才性与玄理》	221
第五章 王弼之老学——王弼《老子注》疏解(节选)	
第五节 道之生成性或实现性:道为“实现原理”之意义	
第七章 魏晋名理正名(节选)	
第八节 境界形态下主客观统一问题	
11.《佛性与般若》	231
序	
如来禅与祖师禅	
附录:分别说与非分别说	
四、净法与无净法:综述诸大小乘教法不同之关节以及最后的圆教	
12.《中国哲学十九讲》	269
第一讲 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	
13.《四因说演讲录》	282
第三讲 儒家如何贯通四因说	
(三)历史与文化论述	292
1.《历史哲学》初版自序	292
2.《道德的理想主义》(节选)	295
关于文化与中国文化	
理想主义的实践之涵义	
3.《政道与治道》(节选)	333
第三章 理性之运用表现与架构表现	

4. 孔子与“人文教”	348
5. 作为宗教的儒教	351
6. 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362
7. 说诗一家言	384
格调篇	
唐雅篇	
诗意图	
8. 《红楼梦》悲剧之演成	414
9. 水浒世界	434
牟宗三先生学术年表	
编者后记	452

导 读

白欲晓

在二十世纪中国新儒学发展史上，牟宗三先生是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牟宗三先生的思想和学术，规模宏大、思理精严，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和时代悲怀。他试图通过哲学的理论疏导，以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的文化设计，为民族文化开辟走向民主和科学的现代新途径。牟宗三先生毕生致力于哲学的创造活动，诠释传统，融通中西，创构了“道德的形上学”哲学系统，被誉为“中国哲学宇宙的巨人”。牟宗三先生杏坛执教逾半个世纪，终身讲学，诲人不倦，培养了大量的学术才俊，被称为“说法第一的哲学大师”。

1945年至1948年四年间，牟宗三先生曾先后在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也曾轮任过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这段时间，是牟宗三先生哲学思想重要的过渡期，也是牟宗三先生历史文化观念走向成熟的时期。

本书作为牟宗三先生哲学与文化论著的选编，力图以最为精要的选择，充分而全面地展现牟宗三先生的哲学创造、历史思考与文化情怀，同时对牟宗三1945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和学术发展作出说明。这里，我们首先介绍牟宗三先生的学思历程，并对牟宗三先生的思想和学术贡献加以述评，以作为本选编的导读。

(一) 牟宗三先生的学思历程

牟宗三先生(1909—1995),字离中,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的一个普通农家。在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五十自述》中,牟宗三先生回忆了自己的少年时光和前半生的学思经历,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记录。

牟宗三将自己的少年时光描述为“在混沌中长成”。牟家世代耕读,还开着一个骡马店。“南来北往运货的骡马,在斜阳残照,牛羊下来的时候,一群一群吆喝而来。我当时十分欣赏那马蹄杂沓之声,又有气、又有势,而又受着时近黄昏的限制,行走了一天,急忙归槽求安息的苍茫意味。”这种苍茫中寻求归途的羁旅之感,仿佛构成了牟宗三一生的生命情调。

在牟宗三看来,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少年时期的感受是自然生命与外境相接时所激起的一些感应的音调,“这些感应音调总不外是相反的两面:一面是清明的、圣洁的、安息恬静的,向往秩序的;一面是迷离的、荒漠的、懊恼不安的,企向于混沌的。这两面造成我生命中的矛盾。我若是顺着这些音调直接地自然地发展下去,我可以是个野人,是个诚朴的农夫,是个开店者,是个走江湖的赶马者,是个浪荡子,但是我没有直接地自然地发展下去,我经过了一曲。”

对于牟宗三来说,一个农家子弟的自然生命正是经过“离其自己”,曲折而破裂了自己,走向了永远的不归之路。牟宗三说:“读书从学使我混沌的自然生命之直接的自然的发展,受了一曲,成为间接的发展。”

牟宗三九岁入私塾,十五岁离开家乡,进入栖霞县城的县立中学,接受新式教育。牟宗三回忆这一段生活,有少年离乡的逆旅之感,更有生命离开原始混沌的无可奈何。他说:“但人世不能只是农民,生命不能只是在其自己,也当离其自己。但生命在其自己究竟是生活的本义。生命离其自己,过一种非生活的生活,究竟是生活之自相矛盾,就是不说这表面的矛盾,究竟也是人生悲惨痛苦之所在。”在牟宗三心目中,植根大地、乡

土的生命才是在其自己的生命，而理智的客观的知识求索则是在对象上生活，是生命“离其自己”的生活。虽然这种生命的曲折是必需的，但并不是生活的究竟圆满所在。

1927年，牟宗三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哲学系。牟宗三自述：“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即决定读哲学。这是我那企向于混沌的气质，对于‘落寞而不落寞’的欣趣，强度的直觉力，所天然决定的。”

初入北大的牟宗三，在北伐革命的大浪漫的时代风气裹挟下，思想观念也泛滥与浪漫开来。“我忽然觉得生命开了，悟解也开了。可是那开是顺那混沌直接地向外膨胀，并没有简别，并没有回环曲折，是生命力的直接向外扑。”当时，牟宗三所欣赏的是吴稚晖在《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与宇宙观》中所表达的浪漫恣肆的唯我主义。因受吴稚晖影响最深，牟宗三思想浪漫狂放，文字粗野荒唐，而改变这一切的竟是以耕读为本的农民父亲的棒喝。他回忆道：“有一次，先父看见了，大为震怒，责斥何以如此。我当时极为羞愧，答以外面风气如何如何。先父则曰：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何可如此不分好歹？外面那些风气算得了什么？我当时肃然惊醒，心思顿觉凝聚，痛悔无地。”三十年后，牟宗三仍感叹道：“我从我父亲身上，亲切地觉得这时代的浮薄，知识分子妄逞聪明，全不济事。没有一个是有根的，没有一个能对他自己的生命负责，对民族生命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文化负责，来说几句有本有根的话。……我愿天下人都当到农村里看看什么是生根的生命，什么是在其自己的生命，什么是真理的见证者，仔细印证一番，对照一番，从头想想，重新作一个有本有根的人，从这里建立自己为一个有本有根的政治家、思想家与事业家。如是，中国方算上了路。”

泛滥浪漫阶段过去，牟宗三开始收摄精神，专心读书。牟宗三以“直觉的解悟”概括这一阶段的生命发展，“在这里，我照察了一些观念，一些玄理。”

最先引起牟宗三兴趣的是朱熹的《朱子语类》。牟宗三回忆说自己在图书馆里发现《朱子语类》，觉得很有意味，却不理解所说的是什么，直到

读了一个月后，突然理会了朱子所说的形上之道是儒家式的“通化的浑一”，是生化万物的“理”之一。虽然在后来的哲学思考中，牟宗三曾批判过朱熹之学，但朱子无疑是引牟宗三入哲学殿堂的第一人。

预科结束后，正式升入哲学系的牟宗三被张申府所授的罗素哲学和数理逻辑所吸引，金岳霖先生和张东荪先生发表在《哲学评论》上的论文也为牟宗三所注意。就所学的西方哲学来说，牟宗三最为用心而感到亲切的是罗素的哲学、数理逻辑和新实在论。课程之外，牟宗三的兴趣则集中在《周易》与西方的怀特海哲学。牟宗三从《周易》中获得了关于宇宙流行的感悟，而《周易》从宇宙论出发对于价值的指点，也特别契合牟宗三当时的“想象式的直觉解悟”。牟宗三通过对汉代易学的研习和晋宋易学的解悟，以清代焦循和胡煦的易学为中心，在大学期间写出平生第一部著作《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与道德哲学》。他在书中推崇清代胡煦和焦循的易学，在牟宗三看来，“胡煦是从周易方面研究自然哲学，解析具体世界；焦循是从周易方面发挥道德哲学，解析价值世界。一个是‘是’的世界，一个是‘宜’的世界。”而对怀特海哲学的兴趣，也是由怀氏机体主义的宇宙论所引发的。

1932年冬天，牟宗三初识熊十力先生，从此入室问学于熊先生。

结识熊十力先生是牟宗三生命中的一大因缘。牟宗三回忆道：“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民国廿一年，那时我廿四岁），有一冬天晚上，我到邓高镜先生家里去，他说我给你一部书看。拿出来，乃是《新唯识论》。署款为‘黄岗熊十力造’。这署款，在一般说来，是很奇特的，因为普通没有这样。我当时就很震动。拿回宿舍，我一晚上把它看完了。开头几章，语句是佛经体，又是接触的佛学问题，我不懂。后面渐渐成为魏晋诸子的文章，看起来比较顺过了。我感觉到一股清新俊逸之气，文章义理俱美极了。当然这只是我匆匆读过后的一霎之感，其内容的原委，非我当时所能知。第二天晚上，我即把这书送还，并问这人是谁。他说我们明天下午即约他在中央公园吃茶，你也可以去，我给你介绍。第二天下午，我准时而到。林宰平先生、汤用彤先生、李证

刚先生俱在座。不一会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气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他那时身体不好，常有病。他们在那闲谈，我在旁边吃瓜子，也不甚注意他们谈些什么。忽然听见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是非凡，直恁地不客气，凶猛得很。我便注意起来，见他眼睛也瞪起来了，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牟宗三感叹道：“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牟宗三从熊十力身上看到的是生命与学间的统一，获得了生命与人格的感召。

1933年，牟宗三北大毕业后，赴山东寿张乡村师范教书。1934年至天津，牟宗三加入张君劢、张东荪发起组建的国家社会党。1935年，牟宗三大学时期写成的《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元学与道德哲学》一书出版。1936年，牟宗三南下广州任教于私立学海书院，后返回北京，主编《再生》杂志。

1937年日寇入侵，牟宗三返乡小住后经南京南下，流寓衡山、桂林、昆明等地。一面是家国天下的危难，一面是个人生存的困顿，在这种困难的境遇下，牟宗三开始了自称为“架构的思辨”的早期哲学创造工作。

在艰难的流寓生活中，牟宗三开始草写自己的第一部逻辑学著作《逻辑典范》。牟宗三对于逻辑学的兴趣，首先得益于大学期间对数理逻辑的学习，不过真正引发他去研究逻辑学，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唯物辩证法大讨论。在讨论中，牟宗三反对以辩证法来代替和批判形式逻辑。牟宗三说：“我之所以对逻辑发生兴趣，是由于讲唯物辩证法的人对于形式逻辑的攻击。”在牟宗三看来，逻辑不过是思维的形式系统，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牟宗三对于契接西方学术传统的思考。牟宗三认为，逻辑这一套形式系统是

人的思想律，“这一步抽象，这一步悬挂，是把握西方希腊学术传统的一个重要关键。这一关键打不通，无法接上西方的学术，无法学会他们的思考方式。”从“架构的思辨”的早期成果《逻辑典范》看，牟宗三主要关注逻辑哲学的基本问题、逻辑的真值系统、命题的推演系统以及逻辑数学的基本原理等。

1939年秋，牟宗三从昆明入四川，由熊十力推荐欲入马一浮创办的复性书院作都讲，未果，赴重庆，再次主编《再生》杂志。1940年，牟宗三由重庆赴云南大理，以讲师名义入住张君劢创办的大理民族文化书院，开始构思《认识心之批判》的写作。《认识心之批判》的思考与写作长达十年之久，1949年完稿，直到1956年才获出版，代表了牟宗三先生“架构的思辨”阶段的最终成果。

《认识心之批判》的理论努力主要是为逻辑确立先验的基础。牟宗三在研究各种逻辑系统时，通过步步审思和追问，逼迫自己不得不承认逻辑有其先验的基础，因此他不赞成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与约定主义，也不赞同潜存世界说和罗素的逻辑原子论，形成了摄逻辑于“知性主义”之“主体主义”。牟宗三认为，逻辑数学俱可回归于知性主体而得其先验性与超越的安立，而知性主体亦正因逻辑数学之回归而得以成为“客观的心”、“逻辑的我”。

居住在大理民族文化书院期间，牟宗三“精神痛苦已极”，“心灵投于抽象之思考，自然生命则下坠而投于醇酒妇人。个体破裂之象由此开其端。普遍性与特殊性趋于两极化，此之谓个体性之破裂。此是生命离其自己而以种种因缘促成之结果，亦是最痛苦之境地。”聊以安慰的是，还有唐君毅先生这样的友人，彼此互通声情、相与论学。牟宗三当时即有感叹：“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也。”

1941年，文化书院解散，牟宗三返回重庆，入住梁漱溟在北碚金刚碑创办的勉仁书院，从游熊十力。在熊十力那里，牟宗三重新体会到儒家传统慧命之相续，为破裂的生命找到了向上一机。他说：“熊师那原始生命之光辉与风姿，家国天下族类之感之强烈，实开吾生命之源而永有所向往

而不至退堕之重大缘由。”

1942年秋，由唐君毅先生介绍，牟宗三赴成都华西大学任教，开始独立讲学。1945年秋，牟宗三转往中央大学任教，之后随中央大学还都南京，于1946年轮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1947年秋，牟宗三受聘于金陵大学与江南大学，任哲学教授，主要讲授逻辑学和西方哲学。1949年春，牟宗三短暂任教于浙江大学，之后于夏秋之交，由广州只身去台湾，开始了后半生的人生漂泊和哲学文化的创造生涯。

牟宗三在《五十自述》中，将1940年之后的这段学思与心路历程以“客观的悲情”加以概括。

牟宗三所谓的“客观悲情”，一方面源自对国家命运多舛的创痛之感，一方面是对民族文化失去根底的哀伤和反省。牟宗三说：“在时代的不断的刺激中，我不断的感受，不断的默识。在不断的默识中，我渐渐体会到时代的风气、学术的风气、知识分子的劣性、家国天下的多难、历史文化的绝续。这一切引发我‘客观的悲情’。由这客观的悲情引我进入‘架构思辨’以外的义理。由于对这义理的渗透。我始能明白这一切之所以如此与所以不如此之‘精神上的根据’。”

在逻辑学与认识论的“架构思辨”之外，牟宗三开始思考民族国家的建设，反省民族文化的病痛，希求从思想文化上探求出路。这一时期，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与历史哲学、康德关于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思考，特别是熊十力对传统儒家慧命的坚持和发掘，成为牟宗三哲学与历史文化探求的重要资源。牟宗三从熊十力那里获得了对儒家意义世界坚持的动力，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客观理解国家与历史的心量，透过康德寻找架构思辨之认识心的根源与向上一机的形上依据。

1947年，任教于中央大学的牟宗三以自己的教授薪金创办了《历史与文化》月刊，这标示着牟宗三哲学思考的新转向。在《历史与文化》月刊的发刊词《大难之后的反省——一个骨干》中，牟宗三呼吁从民族文化上建体立极，建设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

在发表于1947年8月《历史与文化》月刊第三期的《王阳明致良知

教》中,牟宗三除疏解阳明良知理论的基本观念之外,重点讨论了“致良知”教义中的理论困境,即良知之心在致知发用中如何面对物理、容纳知识的问题,牟宗三称之为“致知疑难”。牟宗三说:“一切行为皆须有此知识之条件。……此知识之一套,非良知天理所可给,须知之于外物而待学。”针对这一难题,他提出了“良知坎陷”的解决办法,即良知之心自己“坎陷”自己而转为了别心,与物为对,认识物理,成就知识。《王阳明致良知教》提出的“良知坎陷”,其问题意识是如何在儒家良知之教中融摄知识;其理论上的疏解,是讨论道德心如何通过自我否定、自我曲折而下落为认识心。

1948年,任教于金陵大学和江南大学的牟宗三先生应程兆熊之请,撰写了《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文中阐发了儒家第三期发展的文化观念,提出现代儒家“三统并建”的发展纲领。牟宗三在文中说:“自孔、孟、荀至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为第二期,今则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应为‘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政体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

儒家的“三期发展”、“三统并建”的文化目标以及“良知坎陷”的理论疏导,由此而成为牟宗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外王”理论建设和六十年代以后“道德形上学”哲学建构所处理的核心问题。

由以上介绍可见,牟宗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文化意识与理论思考,成为其后来思想发展的基本方向。

1949年至1956年,牟宗三任教于台湾师院(今台湾师范大学),主讲逻辑学、哲学概论、中国哲学等课程,期间发起成立“人文友会”,通过讲学培养青年才俊,发表了大量对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加以反省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文章。

1950年8月,牟宗三在台湾师院发起成立“人文友会”,采取师友聚会的方式,进行课外讲学。人文友会每两周一次,固定在周末晚上举行,前后共两年,聚会51次,不分校内外,志趣相投者即可参加。人文友会以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中心,探讨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儒家文化的

现代转进及与之相关的西方哲学、文化的具体问题。人文友会敦品励学，陶铸人才，对台湾思想界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

牟宗三这一时期的文章与论著，集中在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政治的反省上，提出了自己关于儒家“新外王”建设的纲领和意见。其成果主要是《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道德理想主义》三部著作，通常被称为“新外王”三书。

在上述著作中，牟宗三提出了儒家思想的当代发展任务，即“三统”的建立：一为道统之肯定，肯定儒家道德宗教之价值；二为学统之开出，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为政统之继续，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

牟宗三通过反省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和传统，对如何由儒家传统道德宗教的内圣之学转出知性主体和民主架构进行了具体的探发与设计。牟宗三以“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来分别概括中西文化的根本精神，又将中国文化生命的特征概括为“理性之运用的表现”，西方文化生命的特征概括为“理性之架构的表现”。他说：“中国文化生命虽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亦未尝不可在从其本源处，转折一下，开辟出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牟宗三所谓的“转折”，就是“良知坎陷”。牟宗三强调，从内圣之运用的表现中直接推不出科学和民主之“理性之架构的表现”，而要通过“坎陷”，此为“曲通”、“曲转”。

1958年元旦，牟宗三与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篇宣言被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大纲和思想旗帜。

1960年，牟宗三应聘至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主讲中国哲学。1968年牟宗三由香港大学转往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哲学系主任，先后讲授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康德哲学、知识论等课程。1974年7月，牟宗三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

香港任教的十余年，牟宗三潜心于哲学研究，重新疏释儒释道三教文献义理，写成《心体与性体》、《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三部巨著，对中